

近十年我国大陆海外新移民

黄润龙 鲍思顿 刘凌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了80年代后期我国海外新移民的数量及其原所在地区分布特点,我国移民的年龄性别构成,结婚生育状况以及受教育状况。文章还探讨了近年来大陆人口移居国外的三种类型:留学,劳务和家庭团聚型。最后对大陆人口海外迁移的原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的分析和研究。

作者 黄润龙,男,198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91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双硕士学位,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访问学者,现为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42)

鲍思顿,男,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原系主任。

刘凌,女,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社会学系在读硕士。

近年来不少学者讨论了中国人口历史迁移的原因,^[1]中国人口国内迁移情况,^[2]和海外华侨的国际分布。^[3]由于资料缘故,涉及中国大陆的国际迁移的文章却较少。^[4]

据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季刊“金融与发展”报道,^[5]1985—1990年中国大陆迁出人口为27万(包括大陆迁出到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下文同),仅低于同期的墨西哥、菲律宾、黎巴嫩(它们分别为75万,29万,28万),属于世界上迁出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关于开展新移民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简称新移民)不断增多,他们作为华侨、华人社会中一支重要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并将成为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友好的中坚力量。”“加强新移民工作,对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扩大我国影响,发展我国同所在国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6]本文主要研究1985—1990年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人口及社会经济特征,具体包括迁出人口的数量和原居住地区,迁出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受教育程度及婚姻生育状态,以及迁出人口的类型和人口迁出的原因,同时还研究了1990—1996年的大陆人口迁移近况。由于资料的缘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迁出人口未予考虑。此外由于迁入到大陆的人数很少,本文所指的移民主要是指离开大陆的人。

本文资料主要源于(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2)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原始数据带;(3)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源于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移民的数量和地区分布特征

第四次人口普查调查了原住本地区现在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暂无户口的人口。通过这一指标可大致了解1985—1990年新移民的地理构成、性别构成及社会经济构成。当然其中存在一些似是而非及似非而是的现象。首先,本资料未包括1985—1990年出国并取得当地户口及中国国籍的人;其次,资料包括了一些短期(三个月以上)出国进修学习、探亲访问、工作经商的人,这些人仍要回国参加工作学习。然而,第一部分人并不

* 本项目获国家出国留学基金委员会(NSCIS)的资助,特致谢意!

多,大部分移民取得国外居住权及国籍而取消中国国籍及户口。第二类人员的构成很复杂,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作法,3个月以上的回归性迁移,非定居性迁移也是国际迁移的一部分。此外,第四次人口普查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些移民国际迁移的时间、国别、理由,因此只能借助于其他资料加以估算。

应该指出中国人口普查资料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国际货币基金估计1985—1990年我国移民27万,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是23.7万(其中男性15.55万,女性8.16万);而1990年1%原始数据带显示出我国迁出移民是24.4万(其中男性16.95万,女性7.05万)。若以1990年普查资料为标准,迁出移民的实际抽样比是1.03%(男性1.09%,女性0.91%)。

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一,国际移民在大陆各地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普查资料分析表明,移民过万的地区有上海、北京、福建、广东和江苏,且此五省市占全国移民的74.13%。而西南、西北九省市仅占全国移民的6.14%,其中西藏、青海、宁夏各省1985—1990年海外移民不足500人。当然,移民数量与居民数量呈正比。表1统计了每万居民中移民的比例,北京和上海的移民比例最高,达40‰以上。移民比例在2‰以上的还有福建、天津和广东。移民比例在1‰~2‰的省市还有辽宁、江苏、湖北、吉林、浙江和黑龙江。由此可见,除湖北省外国际新移民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近年来我国出国移民增长也是比较快的,例如南京市1982年每万人中仅有3人,1990年就增长到11人,8年内几乎翻了两番。1990年全市83%的海外移民户口在南京市区。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原始数据带分析也显示出,80.2%的海外新移民出国前定居于城市,12.8%居住在城镇,仅有7.0%居住在乡村。而同期我国居民有16.7%、7.5%和73.8%分别定居在城市、城镇和乡村。所以,国际迁移主要发生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里。表1也显示出我国三个直辖市迁居国外的比例极高。这种城乡分布情况仅有福建、江苏和辽宁略有例外。分析表明,福建的乡村,特别是侨乡有长久的迁移传统和历史,而江苏、辽宁乡镇企业十分发达,一些企业直接和外资企业,境外企业挂钩,或直接从事对外劳务输出活动。

表1 1990年中国大陆迁出人口及其比例

地区	总迁出人口数(人)	迁出占全国总迁出人口比例(%)	迁出占每万当地居民比例	迁出人口性别比(女性为100)	地区	总迁出人口数(人)	迁出占全国总迁出人口比例(%)	迁出占每万当地居民比例	迁出人口性别比女性=100
北京	48956	20.65	45.25	142	河南	1668	0.70	0.20	291
天津	3817	1.61	4.34	177	湖北	6591	2.78	1.22	278
河北	1476	0.62	0.24	531	湖南	2153	0.91	0.35	211
山西	977	0.41	0.34	274	广东	18688	7.88	2.97	146
内蒙	1489	0.63	0.69	456	广西	1835	0.77	0.43	256
辽宁	7261	3.06	1.84	275	海南	580	0.24	0.88	247
吉林	2744	1.16	1.11	221	四川	6084	2.57	0.57	329
黑龙江	3639	1.54	1.03	166	贵州	859	0.36	0.27	477
上海	66336	27.99	49.72	161	云南	1277	0.54	0.35	278
江苏	12165	5.13	1.81	275	西藏	159	0.07	0.72	112
浙江	4349	1.83	1.05	147	陕西	3250	1.37	0.99	277
安徽	3525	1.49	0.63	209	甘肃	1080	0.46	0.48	306
福建	29580	12.48	9.84	267	青海	223	0.09	0.50	219
江西	1590	0.67	0.42	309	宁夏	456	0.19	0.98	1100
山东	3065	1.29	0.36	289	新疆	1152	0.49	0.76	313
					全国	237024	100	2.10	191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00%)1993。

我国海外移民的民族分布情况分析表明,1990年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的8.08%,但其迁移人口仅为全国海外移民的2.46%,即少数民族出国迁移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满、回、蒙古族是移民较多的少数民族,但也仅为全国海外移民的0.70%、0.45%和0.37%,低于其人口比例0.87%、0.76%和0.42%。如按地区划

分,华东和中南地区少数民族移民仅占该地区移民总数的0.71%和0.44%;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却占本地区移民总数的20%和10%。

二、移民的年龄性别构成

移民主要集中在青壮年年龄组。全国1%四普资料分析显示,65岁以上老人及15岁以下少年儿童仅占移民的0.8%至3.8%,低于全国居民的比例5.6%及27.7%。表2也显示出有近50%的移民在25到35岁之间,或70%的移民在20至40岁之间。即25—35岁(特别是25—29岁)是我国人口迁移的高峰年龄。全部移民的平均年龄、年龄中位数和年龄众数分别为32.4、30.8和26.8岁。男性移民年龄略大于女性年龄(平均年龄是32.98岁和31.17岁,年龄中位数是31.5岁和29.8岁)。

由表1和图1可见,移民的性别比是很高的,女性仅占全国迁移人口的30%左右。特别是宁夏女性移民仅为全区移民总数的8.5%。而在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女性移民比例相对较大,移民的性别比较低。表2给出了各个年龄组的性别比(假定女性为100),由表2可见25—55岁女性人数都偏少,40—45岁女性移民仅占该年龄组移民总数的22%,而仅在15—19岁年龄组男性迁移人口多于女性迁移人口。研究表明,我国移民性别比与我国大学生及职工性别比有关,1978,1980,1985,1990年中国女大学生分别仅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24.2%,23.4%,30.0%和33.7%;1994年末全国女职工仅占职工总数的38.0%,文教卫生、科研、党政单位女职工仅占35.4%。^[7]迁移人口中较高的性别比同时提示,在不久将出现一个以家庭团聚为目的和女性为主的迁移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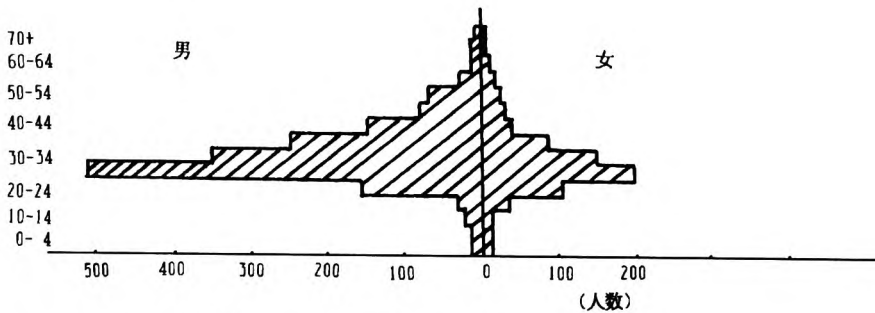


图1 1990年7月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暂无户口的人口年龄金字塔

资料来源:第四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样本为2438人)

表2 1990年各年龄组男女迁出人口占相应总人口比例(%)及迁出人口性别比

	0-14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
男性	2.8	2.0	9.2	30.4	20.6	14.6	9.1	4.3	3.9	3.0
女性	5.8	4.7	14.0	26.8	20.2	11.7	5.7	4.0	3.2	3.9
合计	3.8	2.8	10.7	29.3	20.5	13.7	8.0	4.2	3.7	3.3
性别比	112	97	150	259	233	285	367	243	275	172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原始数据带。

三、移民的受教育程度

移民受教育程度是衡量移民基本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表3给出了我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就全国而言,有42%和11%以上的移民具有大学本科和专科的文化程度,仅7.52%的移民具有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而在大陆居民中仅有0.55%和0.39%的人受过大学本科和专科的教育,58%的居民具有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假定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和本科受教育时间分别为6、9、12、13、14、16年,则15岁以上移民的受教育时间为13年,而居民仅为6.43年,不足移民的一半。文化程度高的人一般说来信息来源比较广、语言能力比较好、适应国外生活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容易迁移成功。移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居民受教育程度是呈线性正相关关系,即居民受教育程度高的省市,移民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其间相关系

数为 0.4535(样本数为 31)。

为此有些专家担心中国大陆高智商人才的流失,实际上人才的国际流动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首先,学成回国人员带回了新的教育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其次,大量人员的出国促进了我国大学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语的教育与研究,促使我国教育体系、课程设置与发达国家相接轨。

表 3 1990 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 15 岁以上移民的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本科	移民平均受教育年数	居民平均受教育年数
北京	0.00	1.89	2.91	9.01	3.78	10.17	72.24	14.9	9.0
天津	1.25	5.00	22.50	6.25	13.75	11.25	40.00	12.8	8.2
河北	0.00	0.00	12.50	37.50	0.00	25.00	25.00	13.1*	6.5
山西	0.00	0.00	0.00	0.00	0.00	12.50	87.50	15.8*	7.1
内蒙	0.00	14.81	18.52	3.70	18.52	18.52	25.93	12.1	6.7
辽宁	1.10	21.98	29.67	16.48	6.59	3.30	20.88	10.6	7.7
吉林	0.00	8.33	22.22	19.44	5.56	0.00	44.44	12.7	7.5
黑龙江	0.00	26.67	33.33	20.00	0.00	6.67	13.33	10.1	7.4
上海	0.00	0.92	15.68	24.91	8.30	15.13	35.06	13.3	8.5
江苏	0.00	16.00	32.00	17.33	0.00	6.67	28.00	11.3	6.5
浙江	0.00	15.00	40.00	5.00	10.00	10.00	20.00	11.0	6.2
安徽	0.00	0.00	20.59	11.76	5.88	2.94	58.82	13.9	5.3
福建	0.62	23.22	33.44	29.41	2.48	3.10	7.74	9.9	6.1
江西	0.00	46.67	13.33	0.00	13.33	13.33	13.33	9.7	6.1
山东	0.00	4.60	10.34	6.90	3.45	9.20	65.52	14.3	6.3
河南	0.00	0.00	25.00	0.00	0.00	25.00	50.00	13.8*	6.4
湖北	0.00	0.00	35.71	21.43	0.00	14.29	28.57	12.4	6.5
湖南	0.00	3.70	18.52	3.70	7.41	33.33	33.33	13.3	6.7
广东	0.61	1.83	11.59	21.34	3.05	25.00	36.59	13.5	7.0
广西	0.00	0.00	11.11	44.44	22.22	0.00	22.22	12.8*	6.6
海南	0.00	0.00	0.00	28.57	0.00	71.43	0.00	13.4*	6.8
四川	8.57	17.14	42.86	14.29	2.86	5.71	8.57	9.1	6.1
贵州	0.00	25.00	25.00	0.00	0.00	0.00	50.00	11.8*	4.9
云南	0.00	16.67	11.11	5.56	11.11	22.22	33.33	12.6*	4.8
西藏	0.00	0.00	100.00	0.00	0.00	0.00	0.00	9.0*	2.3
陕西	0.00	3.23	25.81	16.13	9.68	6.45	38.71	12.8	6.5
甘肃	0.00	0.00	60.00	40.00	0.00	0.00	0.00	10.2*	5.1
青海	66.67	0.00	0.00	0.00	0.00	0.00	33.33	5.3*	5.3
宁夏	0.00	0.00	50.00	0.00	0.00	0.00	50.00	12.5*	5.8
新疆	0.00	0.00	14.29	28.57	14.29	28.57	14.29	12.9*	6.9
全国	0.42	7.10	16.39	17.23	5.38	11.30	42.18	13.0	6.43

资料来源:居民资料来源于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pp2-26(Ⅲ)。移民资料来源于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 1% 原始数据带。带星号 * 表示样本个数不足 10。

四、移民的结婚、生育状况

一般认为,移民结婚迟、结婚率低。人口普查资料上也反映出这一特征(表 4),移民未婚比例及离婚比例较高,已婚及丧偶的比例较低。15—64 岁的女性仅有 72.59% 结过婚(包括离婚和丧偶),而 15—49 岁的女性仅有 68.93% 曾经结过婚。这是因为移民受教育时间较长,他们所面临生活、工作及发展等压力和问题较多。但是,有趣的是移民中男性已婚率高于女性,离婚率却是女性高于男性;而在居民中则恰恰相反。其原委有待于深入研究。如果仅考虑男女性移民的婚姻状况,表 4 显示出,女性移民已婚率相对为低,离婚率、未婚率和丧偶率相对为高。

表 4 1990 年 7 月 1 日我国大陆 15 岁以上男女性居民、移民的婚姻状况 (单位: %)

	未婚	已婚	丧偶	离婚
男性	34.3(29.0)	64.9(66.4)	0.4(3.8)	0.5(0.8)
女性	37.1(21.1)	60.1(70.0)	1.0(8.5)	1.8(0.3)
合计	35.1(25.1)	63.4(68.2)	0.5(6.1)	0.9(0.6)

资料来源:居民资料来源于《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 1993, pp54-55。

移民资料来源于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 1% 原始数据带。

注:括弧内的数据是中国大陆全体居民的婚姻状态。

男女性居民、移民已婚率随各年龄组的变动情况由图 2 给出, 移民与居民的已婚率在 40 岁以前随年龄的分布有着较大的差异, 相同的已婚率移民组要较居民组落后 5—15 岁, 这就说明迁移可以推迟结婚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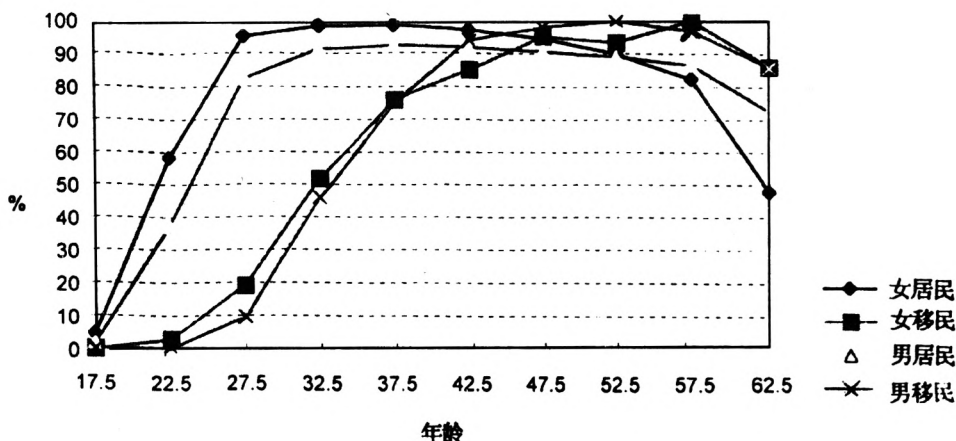


图 2 居民与移民的已婚率随年龄及性别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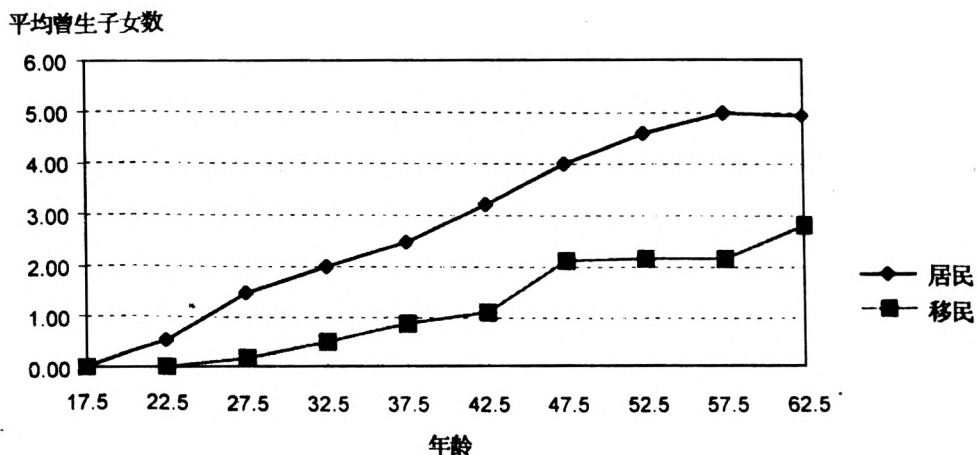


图 3 移民和居民的曾生子女数

普查资料还调查了女性移民的曾生子女数和现存子女数。1990 年 15—64 岁女性迁移人口中, 曾生一个、两个和三个以上子女的比例分别为 29.4%、9.5% 和 3.3%, 平均曾生子女数为 0.599 人(居民为 2.01)。

15—49岁女性迁移人口平均曾生子女数为0.584(居民为1.34)。而同期15—64岁及15—49岁已婚女性移民曾生子女数仅为0.952和0.689人,还是远低于居民的生育水平。图3显示出40岁以上移民平均曾生子女数为一孩,45岁以上女性移民曾生子女数为两孩,几乎是同年龄女性居民生育水平的一半。移民的曾经生育子女的性别比是103.92,属于正常偏低的范围。

五、近年来中国人口移居国外的类型

在1978年平均每100万中国大陆居民中仅有59人次出入国境,其中大陆公民仅为14人次。1988年每100万中国大陆居民中出、入国境人数达613人次,其中大陆公民也仅为62人次(这里都不包括边境往返的情况)。^[8]1996年每100万中国居民中出入国境的中国公民人数竟达11321人次,其中23.46%的人持有因私护照,这还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同胞及海外华人的入境。^[9]1988年大陆到世界各国和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定居的移民比1981年增加了23.44%。1978年,我国居民出海关人数为69.93万人次,1991年增加到304万,1996年为680万左右。1996年大陆申请了因私护照的人口有152.3万人,他们中97.5%的人被批准而获得护照。如果不考虑出国旅游的情况,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去美国、泰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加拿大。此外,还有85.9万人被批准短期去香港、澳门,5.1万人被批准访问台湾。^[10]尽管没有资料进一步显示多少人取得签证,以及他们出境的目的及时间,但是这些信息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已经打开国门,为人们正常的出入境大开绿灯。

中国大陆公民的出国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1)文化科学技术合作、交流型,包括留学生,访问学者;(2)家庭团聚型,定居,探亲访问;(3)劳务输出型,包括对外投资办公司办企业、对外经济贸易和工程项目承包;(4)外交公务型(外交使领馆、驻外使团代表国家及本部门处理事务和执行公务);(5)其他原因(例如收养孤儿)。每个大类还可包括若干小类。应该说,对于个体而言大部分都是属于短期回归性的迁移活动,但对于总体而言都属于国际性迁移。由于资料的缘故,这里仅讨论前三类。

1. 大陆的海外留学生

中国外派留学生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以美国留学为例,1800年James Magee带了一个中国人到美国去学习英语。1818年Wong Arce等首批5个中国年轻人被批准到康涅狄格州Cornwall学校学习。1854年Yung Wing报考耶鲁大学,而后成为中国在美国的第一位大学毕业生。^[11]留学生作为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先导和桥梁,他们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1—1949),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和近期社会经济的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后)都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950—1965年我国平均每年出国留学学生仅为559人,同期回国留学生每年为513人。其中78.65%是到前苏联留学,12.6%是到东欧及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学,80%以上的留学生学业结束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文革时期几乎停派留学生,1972年开始重新试派留学生,1972—1978年平均每年派出297人,回国138人(表5)。1978年6月邓小平提出增大向外派遣留学人员数量的重大决策,1978—1996年末中国大陆共派出27万人次留学生。其中国家出资公派人员为4.4万,各大学及科研单位通过对外交流渠道自筹资金派出8.6万,个人筹资自费留学的为13.9万。^[12]然而至1996年末,学成回国人数仅为9万。其中国家公派留学生回国率为84%,单位公派留学生回国率为56%,自费留学的回国率仅为3%左右。例如天津大学自1978年以来共有3000多人次出国访问、开会、留学,但出国留学3个月以上的仅有906人,^[13]回国率仅为53.53%,即使在1994—1996年回国人员也仅占派出人员的62.65%。

表5给出了我国统计局统计的1954—1994年我国每年派出及回国的留学生人数,1991—1992年,1993—1994年我国留学生的数量出现了激增的态势。因此我们估计1992年前统计的可能仅指国家公派及单位公派留学生,1993年及其以后统计的包括了自费留学人员。主要根据是,1988年签订并公证的留学协议为7735份,^[14]1993及1994年分别为7072、5017份。^[15]可以认为1993—1994年国家及单位公派留学生人数并不多于1988年。但是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大大地增加了自费留学学生的数量,同时也对公费留学人员进行了以提高留学质量,提高回国服务比例为核心的规范化管理。

表5 中国大陆1954—1994年每年派出及回国的留学生人数 (单位:人)

年份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留学人数	1518	2093	2401	529	415	576	441	124	114
回国人数	22	104	258	347	670	1380	2217	1403	980
年份	1963	1964	1965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留学人数	62	650	454	36	259	180	245	277	220
回国人数	426	191	199	不清	不清	70	186	189	270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留学人数	860	1777	2124	2922	2326	2633	3073	4888	4676
回国人数	248	231	162	1143	2116	2303	2920	1424	1388
回国人数*	N.A.	665	1187	2146	2722	3312	3581	3674	5235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合计
留学人数	4703	3786	3329	2950	2900	6540	10742	19000	79229
回国人数	1605	3000	1753	1593	2069	3611	5128	5000	55694
回国人数*	5519	6073	4997	不清	不清	不清	不清	不清	39111

资料来源:带星号的资料来源于1990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其包括所有的留学人员。1991年后的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P589;其他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P691。合计是指1978年至1994年的合计数。

目前中国留学生遍及世界103个国家和地区。然而,70%的留学生在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学习,95%的留学生在发达国家留学,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据1978—1991年资料统计,56%的学生在美国留学,17%的学生在日本留学,在加拿大及德国留学的学生都占8%;另有4%、3%和2%的学生在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留学。^[16]而从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学成回国人员分别占全国回国人员总数的41%,21%,6%,10%,9%,4%,2%。^[17]如果这个比例在90年代初一直稳定不变,则1978—1996年大陆共有27万人次留学,其中赴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的留学人员分别为15.1万、4.6万、2.2万和2.2万人次,而到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的留学人员分别为1.1万、0.8万和0.5万,因此滞留在美、日、加、德、英、法、澳的留学人员累计分别为11.4万、2.7万、1.7万、1.3万、0.3万、0.4万、0.3万,共18万多人。这些人就构成我国90年代新移民的大部分。与老移民不同的是他们迁入时年龄偏大、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及良好的职业训练、熟悉现代化设施,出国以前大部分人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并来自于我国东部大中城市。目前,其中很多人都已取得了所在国的长期居住资格或加入了该国国籍。

以上是1978—1996年的大致情况,若干报道显示目前这股留学浪潮没有减弱的趋势。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统计,1995年初中国大陆在美国注册的学生就有44380人,占全美国外籍学生的9.87%。^[18]1996年底大陆在日本的留学生为24000人,在德国的留学生为12000人,在整个欧洲的留学生为24000人之多,读博士和博士后的研究生占留德学生的20%。1993年后每年回国人员为460人,仅占学生的4%左右,回国人员中有16%得到博士学位。^[19]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竟达4万多。^[20]另外这些定居的学生还不断地携带其配偶及子女来定居,或邀请父母来探亲访问。这就加快了人口迁移的速度。同时也促进了民间文化、经济技术、信息的交流,及国际航空事业的发展。

我国留学政策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由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我国富余劳动力较多,而劳动生产率低下,部分领域教育与实际需要相脱离,在大多数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及部分管理科学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的差异。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规定了大学毕业后及留学回国以后的法定服务期。这种制度化、法制化的作法得到了大多数留学人员的拥护。国内不少大学将国外的留学人员数作为教育质量评定标准之一。而将学生在国外找到工作,能挣钱作为一种能力。孰是孰非有待考察。

2. 中国大陆的劳务输出

我国的劳务输出大致可分成熟练技术工人或工程技术人员(技术援外、工程承包)和国内企业的驻外办事机构。从个体上讲他们属于回归性迁移,2—4年后他们将陆续回国。但他们总体人数有增无减,发展速度非常快。从总体上讲他们属于永久性海外移民。

中国的劳务输出有很长的历史,一直是解决我国劳动力过剩的最直接的方法之一。但是过去长期国弱受

欺,劳动力长期被当作苦力或猪仔看待。1949—1976年我国官方组织的劳务输出几乎为零。1979年2—3万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进入伊拉克、香港、澳门的劳务市场;1985年5万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进入北部非洲、前苏联、东欧、美国和拉丁美洲。1991年大约有9万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输出分布于138个国家与地区。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专门从事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1978—1991年全国累计有50万人次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输出到138个国家与地区。劳务输出既缓减了当地就业压力,又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了人才,开拓了市场,帮助人们致富。很多人认为劳务输出让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挣了票子,换了脑子,长了见识,学了技术。

80年代初期中国技术人员主要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91年技术人员输出到香港、澳门、北也门、前苏联、美国、黎巴嫩、新加坡和日本分别占劳务输出总数的21.31%,13.17%,11.07%,8.38%,7.66%,7.53%,5.87%和4.66%。如果我们比较1982—1988年劳务输出地的变化,则可以发现亚洲的比例降低了,由79%减少到56%,欧洲由3%增加到11.8%,北美由2%增加到7.8%,而在非洲(15%至14%)、拉丁美洲(1%至1.6%)和大洋洲(1%至1.3%)则变化不大。^[21]目前中国的劳务输出正朝着多国家、多领域、高科技、多层次方向发展。

据统计,1994年我国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1702份,合同金额6028万美元,对外劳务合作合同15789份,合同金额1960万美元,合同份数分别比1991年增加45.3%和117.3%,合同金额分别比1991年增加138.8%和80.6%。^[22]1994年海外劳务输出人数估计比1991年增加80%,全国达16万左右。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1979年开始国内不少企业对外投资,利用国外的资金、资源、产品销售优势办厂、办公司。还有不少企业在境外开设办事处、营业处,代办有关业务。到1991年年末我国已到106个国家和地区,办理了1683个境外企业和公司。^[23]并且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境外企业、公司的设立保障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和正常运转。

3. 家庭团聚型迁移

家庭团聚既可表现为短时间的出国访问、探亲,也可表现为长时间的定居、迁移。家庭团聚型的迁移是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是以男性为主,当男性取得了合法居住权利和有了稳定经济收入后,将会接其太太来定居,这是小家庭的团聚;而当他们找到了适当的工作并且有了小孩以后,将会接其父母亲来探亲和帮助带孩子、料理家庭,以减轻养育孩子的费用,这是大家庭的团聚。这些主要表现在留学生家庭的团聚,迁出目的地主要为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等留学生比较集中的经济发达国家。

另据国内人口迁移资料分析也表明,女性迁移主要是由于婚姻上的原因(28.29%)。很多女性将婚姻视作第二次可选择的出生,有些人不惜牺牲年龄、青春、才干,利用婚姻来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状态。国际人口迁移中,这类现象也为数不少。这些人主要迁移目的地是与中国文化、习惯、风俗相近的港澳、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国家。据美国《世界日报》1997年4月18日报道,自1993年起广东累计有13.7万港人所生子女申请赴港定居,经港方确认符合资格的有6万多,目前正以每年9000人(全国1.6万人)的速度安排赴港定居。台湾给大陆配偶每年來台依附亲人的配额是1080人,这些來台新娘住满一年即可申请长期居住及入籍。

六、中国人口海外迁移的原因分析

1. 定性分析

中国人口海外迁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浅层次的表面原因是为了学习、开拓市场和家庭团聚,但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却是中国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异。由于人口众多资源贫乏,199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仅为1633元人民币约合300美元(当年值),处于当时150个国家和地区的倒数20位内。全国各种行业的平均工资也仅有2140元人民币。^[24]而同年美籍华人的月平均收入为1850美元,为中国职工收入的50—60倍。此外中国的物价、消费指数和恩格尔系数都很高,人民的实际购买能力却比较低,甚至不足美国贫困人口生活线的30%。

其次,社会(户口)问题,有些大学毕业生本人虽然分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但与配偶两地分居,其配偶没有相应大城市户口,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也没有廉价的单位分配的住房,双方很难团聚。按照过去的规定,要大学毕业以后或取得某一职称若干年以后,才能考虑其配偶户口迁移问题。很多人认为解决户口、配偶

工作及住房问题比出国争取奖学金还要难。

此外,新毕业的青年学生常受到一定的社会歧视,在传统的论资排辈管理体制下,提职提干机会少,住房分配差、工资待遇低,工作条件差而压力却比较大,其本人内在潜力和理论知识很难在短时期内发挥出来。拿不到科研资金,工作中不受重视。由于有些地方的法制化尚不健全,很多事情要靠所谓的关系或关系网才能解决。这些都是新毕业大学生不稳定而定居国外的原因。

2. 定量分析

为了定量分析海外移民在我国大陆各地区的分布情况,本文将各地区 1985—1990 年迁出人口数及其占当地居民的比例(单位:1/10000)作为因变量,而 90 年代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变量,如 1990 年各地区人口密度、15 岁以上人均受教育年数、出生时预期寿命、非农业人口比例和 1988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自变量。

首先计算各变量本身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其次计算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 6)。这里假定改革开放程度高、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即人口密度大、人口受教育年数较长、非农业人口比例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人口身体素质好的地区,海外迁出人口较多、迁出人口占当地居民的比重也较高。表 6 的相关系数计算证明了上述假设。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都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

表 6 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

迁出人口数	迁出占当地居民比例‰	人口密度/(km)	平均受教育年数	出生时预期寿命 e(0)	非农人口比例(%)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88	
迁出人口数	0.9504 (0.000)	0.7838 (0.000)	0.5006 (0.005)	0.5428 (0.002)	0.6492 (0.000)	0.8538 (0.000)	
迁出占居民比例		0.7603 (0.000)	0.5134 (0.004)	0.4718 (0.008)	0.7267 (0.000)	0.8879 (0.000)	
平均值	7901	4.34	321	6.42	68.8	25.7	1475
标准差	15018	11.88	396	1.28	3.58	15	1001

括弧内的数据是相关系数的统计显著性水平值。

图 4 给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各地区迁出人口的散点图。由图可见,他们基本上是呈直线分布的,仅天津(迁出人口偏少),福建(偏多)略有例外,其间相关系数高达 0.8538(n=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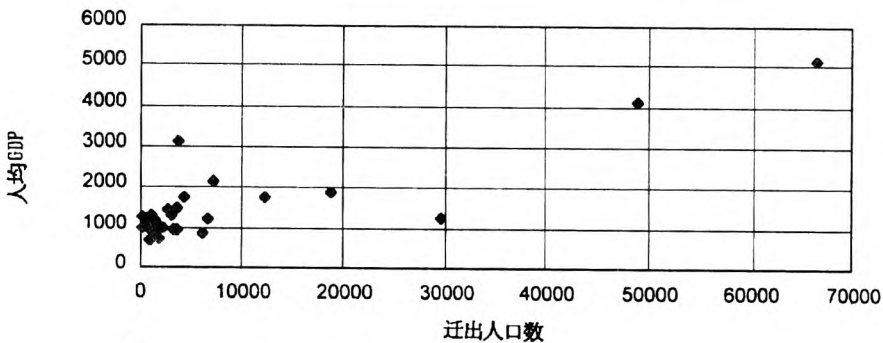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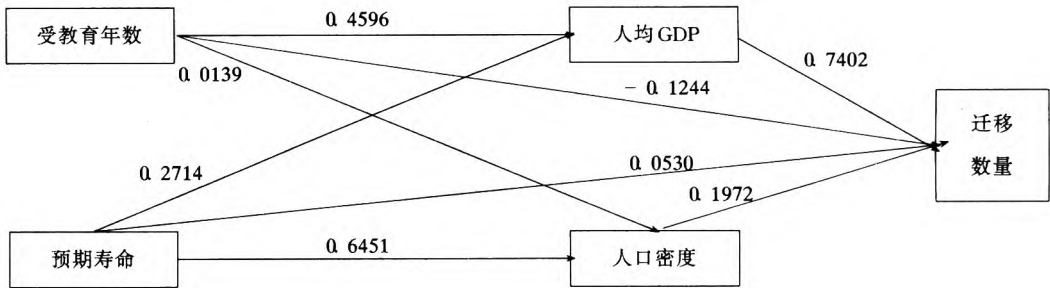


图 4 各地区迁出人口数与人均 GDP 示意图

我们还用路径分析的方法,研究多个社会经济变量对中国大陆各地区迁出人口影响的途径强度。即由多元线性方程中计算出标准化的偏回归系数(路径系数)。每个路径系数代表着自变量改变一个标准单位时,因变量的变动程度。从下图可见,经济原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为次,而教育(人均受教育年数)和健康(出生时预期寿命)对各地区迁移数量的影响是潜在的,其间接影响远大于其直接影响。例如受教育年数对各地区迁出人口数量的直接、间接影响分别为 -0.1244、0.3429;而预期寿命对各地区迁出人口数量的直接、间接影响分别为 0.0530、0.3281。细分析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人口的海外

迁移情况很复杂, 劳务输出及探亲、家庭团聚迁出, 与因留学迁出类所受文化教育、年龄和生活背景的差异都很大。此外, 人口迁出尚受历史迁出人口数量和地区迁移传统的影响。这些随机性、不确定性干扰了教育、健康因素对地区迁出人口的影响。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 1985—1990 年中国人口的海外迁出情况, 包括迁出人口的数量和原居住地区, 迁出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文化构成及婚姻状况, 迁出人口的类型以及人口迁出的原因。也研究了 1990—1996 年的大陆人口迁移近况, 详细分析了 1990 年前后我国大陆新移民的人口及社会经济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1985—1990 年我国新移民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 尤其是上海、北京、福建、广东和江苏占全国移民的 74.13%; 而全国西南、西北部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迁移人数比例较低。

2. 我国新移民年龄主要集中在 25—35 岁(占移民总数的 49.8%), 仅有 0.8% 和 3.8% 的新移民高于 65 岁或低于 15 岁。男性移民的平均年龄略大于女性移民。女性移民仅占全国移民总数的 30%。

3. 15 岁以上新移民中有 42% 和 11% 的移民具有大学本科或专科的文化程度, 仅有 7.52% 移民具有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移民平均受教育年数要比我国平均水平(6.43)高一倍。

4. 移民的未婚比例较高, 而已婚及丧偶比例较低。移民结婚迟、生育水平低。终身生育子女数(45 岁后曾生子女数)大致是我国居民的一半。

5. 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人民出国旅居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国人口的海外移民大致可分为留学型、探亲定居型和劳务输出型等多种类型。1978—1996 年我国共派出 27 万人次留学生, 学成回国 9 万人次。其中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的回国率分别为 84%、56% 和 3%。目前滞留在美、日、加、德、英、法、澳的留学人员分别为 11.4 万、2.7 万、1.7 万、1.3 万、0.3 万、0.4 万、0.3 万多人。这些人构成我国 90 年代大部分新移民。

6. 我国劳务输出队伍发展很快, 1985 年是 5 万、1991 年为 9 万, 1994 年根据劳务合同金额及合同份数估计为 16 万人。目前劳务输出地主要在亚非欧美四大洲, 及港澳、独联体、美国、日本、新加坡、北也门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7. 近期我国人口海外迁移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 即人们经济收入及实际购买能力。此外, 居住户口、住房和配偶的工作问题也是促使迁移的社会原因之一。

8. 我国各地区海外迁移的人数多少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改革开放程度、经济发达程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 而地区文化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和迁移传统对地区人口迁移数量也有较大的潜在影响。

参考文献:

- 1 朱国宏. 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
- 2 Ma Z, Liaw K. Education selectivity in internal migration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1994 Jul. (16): 1355-59
- 3 Poston, Dudley L. Jr; Mao Michael Xixiang and Yu Mei-Yu, 1994,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round 199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0 No 3, 631-645

(下转第 18 页)

